

整个社会都要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

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就一个中学生提出的问题
开展讨论，引导青年正确分析现实，选择正确的生活道路

本报讯 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今年一月下旬一起刊登了上海师范大学第一附中一个中学生写的题为《一个中学生的苦闷》的稿件。这个学生谈了她个人对当前社会现象的一些看法，揭示了当前青年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解放日报》以《什么是生活的正确道路》为题开辟了《青年思想通信》专栏，《文汇报》以《怎样帮助她解除苦闷》为题组织了问题讨论。这场讨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两报陆续收到上海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来信两千五百多封。许多大中学、工厂、连队都进行了讨论，这个讨论甚至还深入到一些家庭中去了。青年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有关部门领导干部，也都关心这场讨论，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这个中学生本人也收到许多热情洋溢的信件，使她感到社会的温暖，受到很深的教育。这个中学生会是共青团员，学习努力，要求进步。她看到社会上的一些消极现象，感到不能理解，产生了一些苦闷情绪。她同班主任谈了她的思想，并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谈自己的认识，这就是后来报上发表的稿件。由于对社会现象不能给以正确的分析，稿件中说：她所接触的人或事物，“好像被虚伪和欺骗笼罩着，许多人都为了自己”，“即使在这社会主义社会，做金钱奴隶的依然大有人在。当然社会上也有存在着无私的人，他们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但这批人毕竟是少数”，“因为我往往把所谓这方面的事情看得太多了，觉得这种生活和空气使我窒息，找不到究竟应该怎样做人，找不到生活的真正的道路”。她在《解放日报》《文

汇报》发表的日记片断中表示，希望通过讨论，使自己端正认识，更好地学习、思考、前进。参加这场讨论的同志，绝大多数认为，这位青年的思想感情是真挚的，她能够认真思考问题，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真实思想，这正是要求进步的表现。许多文章认为，社会上一些阴暗的东西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在经济生活、人的思想、社会风气各方面所留下的严重创伤，治疗这些创伤需要时间。不承认我们的社会弊病是不对的，但更要看到我们社会的主流，看到光明面。在两千多封来信中，大家举出上千个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闪烁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事例。一位读者来信说，人并不都是自私的。几年来，他的生活全靠别人料理。在他患病期间，有两位解放军同志每天放弃午休给他扎针，街道负责同志，每天给他送饭。有三个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青年来信说，他们亲眼看到参军才几个月的新战士在前线如何英勇杀敌，视死如归，来信说：“这些事实说明，我们这一代青年中，虽然颓废者有之，徘徊者有之，但从总体上说，积极向上，甘心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是大多数。”许多来信指出，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一切不适应历史发展要求的观念、习惯、风俗终究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抛弃。许多老一辈的同志在信稿中用自己的革命经历鼓励青年振奋精神，正视困难，满怀信心，用美丽的青春改变祖国的面貌。在讨论中，还探讨了怎样正确地分析现实问题。许多来信指出：这一代青年人关心政治，关心社会，这是很好的。但其中

不少人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基础理论，因此，有些人往往不能正确地全面地看问题。当务之急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知识教育青年，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找到生活的正确道路。教育工作者从这场讨论中，进一步看到自己的责任所在。在两报分别召开的教师座谈会上，教师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青年学生的思想很活跃，勇于思考，努力学习正确的生活道路，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很不满，这正是他们积极向上的表现。但是，由于对他们引导不够，加上他们缺乏社会生活的经验和分析问题能力，对一些社会现象产生模糊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为此，我们教育工作者要挑起重担，用极大的热情去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理想，培养高尚的革命情操。不少来信呼吁整个社会、各条战线都应该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都要考虑如何为加强对青年的思想工作做出贡献。学校领导不能片面追求升学率而放松思想工作；宣传工作者应该改变公式化、简单化的宣传方法，使宣传工作切合青年实际情况；理论工作者要研究如何向青年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育；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要细心研究青年问题；作家要为青年多写焕发革命精神的好作品；音乐家要为青年创作更多的鼓舞斗志、奋发向上的歌曲。要加强对青年欣赏古今中外文艺作品和电影的辅导工作，提高他们摒弃糟粕、吸取精华的能力。这次讨论使很多青年受到教育，他们希望今后这样的讨论能继续下去，深入下去。上海师大第一附中这位中学生在给《文汇报》写的学习体会文章中说，通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她学到了不少东西，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解除了不少苦闷。上海两报编辑部的同志认为，在报上如何揭示青年的真实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探讨和教育，这次讨论是一次成功的尝试。青年中各种思想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引导，不能回避。而要引导好，必须抓住青年的脉搏，以平等的态度，设身处地的方式，同他们一起去思考问题的有同志原来担心，在报上进行的这样的讨论，会不会扩大某些消极东西的影响？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从这次讨论中可以看出，广大青年是富有朝气，勇于上进，不甘心虚度年华的。他们的苦闷是应该解决也是可以解决的。这次讨论中，凡结合切身身体会来谈思想的文章都受到青年的欢迎，引起他们深思；空洞的说教式的文章则不受欢迎。在当前新形势下，报刊需要找到教育青年的各种有效途径，掌握对青年一代做宣传工作的艺术。

出席科协“十大”的十一个学会代表联名倡议

恢复加强生物教学适应四化需要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七日电 出席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生物学的十一个学会的代表，昨天在分组讨论会上联名提出了一项关于恢复和加强生物教学的倡议。他们认为，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中等学校里的生物课被无限取消。现在，有的地方虽然逐渐恢复了生物课，但是，师资、教材和教学、实验设备奇缺，很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们倡议，希望教育部门充分重视生物科学，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生物学教学。提出倡议的一些专家说，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动、植物和微生物资源，进行生物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农业为基础，进行生物教学，可使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懂得动、植物的生活规律，就能更好地从事农业现代化建设。生物学是医学的基础，与工业特别是轻工业，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活的能源”，研究哲学，也离不开生物学。总之，四化建设不能没有生物学。为了加强生物教学，这十一个学会的代表提出如下具体建议：一、希望有关领导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让全国生物教师迅速归队，同时对中学生物学教师和小学常识教师，进行短期培训；二、尽快编写较为先进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学生物学教材；三、恢复和加强全国中等学校的生物课程；四、组织生物学教学标本及仪器生产；五、在中学生中倡导有关生物学的野营、实习等有益活动；六、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的生物学内容，以鼓励中学生在智育上的全面发展。代表们在提出这些建议的同时，还要求为这些建议的实现，首先作出贡献。他们将把对中学生物学教师和小学常识教师的短期培训工作，列入各自学会的重要议事日程。

新华社 共青团
北京三月十 中央书记、
八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今天下午会见由索马里革命青年联盟主席萨拉丁·阿巴斯·罗勃兼率领的索马里革命青年联盟代表团。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石油地质国际学术会议在京开幕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八日电 石油地质国际学术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和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委员会共同发起召开的。这是在我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性的石油地质学术会议。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近三十个国家的六十多位石油地质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在预期五天的会议上，他们将交流石油地质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石油地质勘探的经验，以推进发展中国家石油地质学的发展。李强同西班牙商业和旅游大臣会谈据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七日电 外贸部长李强同西班牙商业和旅游大臣加西亚·迭斯今天上午举行会谈。双方就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今晚，李强部长设宴招待加西亚·迭斯大臣一行。加西亚·迭斯大臣在京期间，还将会见煤炭部、石油部、交通部 and 贸促会的负责人，就双方可能进行技术合作的领域和合资办企业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北京市种公牛站人工授精繁殖良种牛取得成绩

本报讯 北京市种公牛站推广应用家畜冷冻精液人工授精繁殖新技术，发展全市奶牛生产和改良郊区部分黄牛，取得可喜成绩。我国自六十年代开始研究家畜冷冻精液人工授精繁殖技术。一九七三年在北京市郊农场种畜站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市种公牛站。建站前，北京市奶牛业共有四十多个牛场，一万多头奶牛，共同饲养公牛一百三十五头。建站后，由于采用这种新技术，种公牛配种利用率提高了几十倍以至上百倍，仅选留二十多头种公牛，就足够北京的奶牛业使用，并可支援外地。由于大大减少了种公牛饲养头数，建站七年来节省饲养费一百一十多万元，节省饲料粮二百多万斤和粗饲料近千吨。七年来，这个种公牛站共生产优良种公牛冷冻精液二百三十



家畜冷冻精液人工授精繁殖技术

家畜冷冻精液人工授精繁殖技术，是将人工采集的公牛精液，在超低温下冷冻保存起来，等到配种的时候，再把这种冷冻精液升温复活，然后注入母牛子宫里去，使母牛受孕。这种冷冻精液，保存在摄氏零下九十度的液氮罐里，使精子处于休眠状态，可以保存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自然配种一头公牛一年只能

配几十头至一百头母牛。而应用这种新技术，一头公牛一年生产的精液就可配至千头至一万头母牛。假如有一头最好的良种公牛，把它一次排射的精液，冷冻成很多小颗粒或分装在很多小塑料细管中冷冻保存起来，将来每一粒或每一管都可以配一头母牛。即使这头最好的公牛年老死掉了，它年轻壮时的精液，经过冷冻保存还可以随时取用。

科玄

土面增温剂的妙用抑制水分蒸发 提高土壤温度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蔡发枢

我国北方一些盐渍地区应用土面增温剂，还能减少地表盐分的积累。这是由于覆盖膜在抑制水分蒸发的同时，也使溶于水中的盐分向土壤表层运动的速度减缓。使用农业化学覆盖物质是化学改碱的一个途径，有些国家就把这一类物质作为盐渍土改良剂。抗御风吹水蚀，是覆盖膜的一种机械保护作用。在目前，土面增温剂主要用于多种作物的早春育苗，包括水稻、棉花、甘薯、玉米等，以及多种果树和蔬菜。用于水稻育秧，成秧率一般提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有明显的增产效果。用于棉花育苗，效果更好。用塑料薄膜配合增温剂育苗甘薯，可以取代火坑，大大降低成本。而且薯苗素质有所提高。用于蔬菜栽培，可以使蔬菜提早上市、缓和淡季，调节茬口，提高产量。用于果树育苗，可以省去稻草覆盖，能提早播种，提高出苗率，是一种新型的树木育苗方法。

北京郊区推广板栗良种

本报讯 北京市农科院果树研究所选育的“燕丰”、“燕山红”两个板栗良种，已在密云、怀柔、昌平和房山等县的部分板栗产区推广，增产效果显著，受到社员欢迎。“燕丰”高接树当年可挂果，产量比当地一般栗树高三倍，果味甜香，富糯性。“燕山红”高接树三年的平均产量比对照树高两倍多，果实鲜艳有光泽，品质也较好。



因地制宜地推广农业科技成果

搞农业现代化需要各种投资，培养技术人才也是一种投资，而且比其他投资更重要。这是山东省掖县王贾大队党支部办农民业余技术学校的体会。

这个大队坚持办学校二十六年，不间断地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农业技术人才。

二十六年贵在坚持

王贾大队的业余技术学校是在合作化高潮中诞生的。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一个技术学习小组，根据生产需要，学习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的技术知识。他们边学边干，从外地引进二十个谷子良种，在试验田里获得了亩产八百二十斤的高产，比当地老品种产量高一倍半。这件事引起了干部社员对学习农业技术知识的兴趣。后来，他们又把学习小组发展成为业余技术学校，参加学习的人数由十几人增加到一百多人，涌现出一批土专家。科学技术武装了农民，促进了生产，一九五六年粮食亩产就上了《纲要》，一九六三年过了“长江”，一九六六年超过了千斤。林彪、“四人帮”横行时，王贾大队的业余技术学校也一度改成了所谓“政治夜校”。农业科研活动开展不起来，给生产带来很大影响。这使党支部感到，不学农业技术就没有好饭吃。党支部根据群众的要求和生产的需要，重新设立了技术专业班，增添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教学内容。业余技术学校又兴旺起来了。

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大队党支部建立了业余教育领导小组，加强了对业余技术学校的领导。大队挑选了十六名有实践经验的技朮员兼任义务教师，发动教师编写了一批乡土教材；另外，还经常请专业院校的教师进行业务指导和讲课。业余技术校借用小学的实验设备和大队的会议室作课堂讲学，利用大队科研站的实验设备做各种实验活动。这样，技术学校既保持了业余的特点，又提高了办学质量。

适应生产灵活安排

王贾大队的业余技术学校，在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力求适应农村特点，讲求实效。学校设立了农技、机械、畜牧、卫生、蚕业等七个专业班，共有学员一百四十三名。大队党支部、管委会和十名生产队长，也根据自己的分工和专长分别担任不同的专业班学习。这样，干什么，学什么，生产分工与学习专业挂钩，学习效果良好。学校还设立了普通班，组织刚毕业的、初中学生学习农业基础知识。

学校还根据生产需要安排学习内容，实行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例如，农技班，管前学管，收前学选(种)，使教学走到农时季节的前头。去年，畜牧班根据发展多种经营的需要，增加了饲养牛

一项更重要的农业“投资”——山东掖县王贾大队坚持办农民业余技术学校的调查

食鸡、长毛兔、莱牛等有关知识的教学内容，及时为大队新建的饲养场培养了一批饲养员。他们还把生产中的难点作为教学和科学实验的重点。例如，这个大队出现了小麦全蚀病，他们便把防治小麦全蚀病作为课题，总结出适当早播、增施有机肥料、更换品种等措施，终于控制了全蚀病的发展。

出了人才促了生产

王贾大队业余技术学校坚持勤俭办学，一年的教学费用，包括教师备课讲课用的笔墨纸、试验用药、电灯照明等，还不足八元，仅占大队一年生产总费用的百分之零一点二。干部和群众说：别处注意紧一紧，办学的经费就出来了。这个大队每年教育总支收入一百多万元，用来办这枝的这笔“投资”为数不大，但投到了点子上，收到的效果越来越明显。一、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二十多年来，全大队百分之八十的社员参加过业余技术学校学习。先后培养出具有中专以上程度的各种技术人才一百九十六名。他们绝大部分成为本大队的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还有二十一人被选拔到省、地、县科技部门，二十人在公社一级农技、机械、兽医等部门工作。二人被省农科院特聘为研究员，二人成为农学院的兼职教师。七十三岁的张永茂，合作化时期就参加业余技术学校学习。二十多年来，他刻苦学习农业机械知识，带领革新小组，先后研制出中耕机、筑埂机、弹簧耙、小麦清选机等四十二种农具。一九七八年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并受到了嘉奖。二、创出了一批农业科研成果。二十多年来，他们共选育推广了三十多个农作物良种，七次大面积更换小麦、玉米品种；先后四次改革耕作制度，使复种指数达到百分之二百以上；基本上还清了当前农业生产债务的发展规律和防治办法。全大队的大牲畜和猪全部实行了品种改良，猪的育肥期由一个月缩短到四十五天。蚕业队的妇女采用的“少回全叶育”、“桑蚕喂养给桑比”等育苗蚕桑法，受到了山东省科学大会的嘉奖。三、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这个大队粮食亩产解放初期不到三百斤，一九七六年达到一千八百五十四斤。去年，交售给国家粮食一百九十五万七千斤，平均每户三千多斤；交售肥猪一千五百五十四头，平均每户二点五头；社员分派达到一百八十元。看到这些成绩，干部社员一致称赞业余技术学校是发展生产的“参谋部”、先进技术的“推广站”。

烟台地委宣传部 李兆德 蔡国瑞 赵树国

对上海演出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和刊物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这两部作品主要肯定有什么?有些什么主要的倾向?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还有第三个问题,真实性和倾向性这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也结合这次讨论的具体作品,谈谈我的意见。实际上只是提出问题,希望和大家讨论。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两个作品有两方面是要肯定的。一,这两个作品都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中十分尖锐的问题,党的干部队伍中不正之风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党是否脱离群众,是否变质,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肯定这两个作品的作者揭露这些尖锐问题的勇敢精神是完全必要的。否认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不公平的。至于现实的政治斗争把这个问题的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当前主要批判的方向是什么,这是另一个问题。党中央对当前的现实斗争提出的主要打击方向,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文艺工作者往往更多的依靠自己直接的观察,对于自己直接接触到生活可能更有更深的体会,也更易激发自己的感情,但对于全局,对于决定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各种因素,党中央会了解得更清楚。我们应该相信党中央的方针是从实际出发的,是符合实际团结和实现四化现代化的需要的。但是,并不是说这样便改变了问题的实质,因此,作品的意义还是应该肯定的。

有人提出,《骗子》、《在社会的档案里》写的問題不是普遍的,到底有没有典型性?这个問題其实几十年前就解决了。典型的東西,有时可能是少数。萌芽状态的東西也是少数。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这样。萌芽状态的暂时还是属于少数的事情,只要带倾向性,都有典型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懂得,应当反映。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整风时,就批评过当时党的不正之风。他也说过,这些现象在当时也是少数,但是典型的。这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而且认为这是党的正确作风不相容的,完全有反对之必要。因此,《骗子》、《在社会的档案里》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现象虽然不能代表全体党的干部、甚至也不能代表大多数干部,但它的确有典型性,合乎倾向性,应该重视。邓小平同志不久前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分析了党员的思想状况,不能以党中央最先进了解党内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党现出些不正之风,这不仅不仅包括没有经过锻炼的新党员,也包括老党员、老党员。《在社会的档案里》的那个“首长”毫无疑问是不够的,不仅不够格,而且已经完全走向反面了。《骗子》中的赵部长、钱处长、孙局长也都属于不同程度上不够格的党员。为什么不能反映呢?应当肯定我们的年青的作家对错误现象猛烈冲击的勇敢精神,应该肯定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有这种精神是很不寻常的。

二,这两部作品在艺术上都有显著的长处,有真实性,而且,不少地方是值得深创的。因为作者是在写生活,写生活中令他们激动的东西,因此,我们看的时候,有些地方也是令我们激动的。《骗子》这个故事就有些好得说假话,但是,它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定根据的。正因为现实生活中不但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谋私利,而且他的子女也可以利用父亲的地位和权力作坏事,因此也就有一些干部想去利用这样的领导干部的子女去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且,也就有反映骗子利用这种现实关系去进行活动的地盘。《骗子》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尖锐的、不合理的、畸形的现象,有它一定的真实性,作者批判这种现象是正当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在艺术上也有它的长处。当然,把犯罪活动写得太过火了,看了令人不舒服。这说明作者还是有庸俗的趣味,没有格调不高的地方。但些并非都是作品的核心部分,这是好戏的。李丽芳这个人物写得比较深刻,她走火入魔的描写,当然是由于她所谓“首长”侮辱了她,同时也有当时她所处的那个特定环境,包括她的父亲和她已婚的丈夫,把她推上了毁灭的道路,这点是值得深刻的。把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写出来了。看了这个作品,感到新中国还保留着很多旧中国的痕迹,很多人身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这使一个女孩子走向毁灭的推动力。要充分估计到封建势力影响的根深蒂固,李丽芳这个人物存在,而且以后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封建主义在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并没有意识到不但自己受到封建意识的毒害,而且这种封建意识还成了把李丽芳推向毁灭、堕落道路的一种可怕的习惯势力。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作者主要并不在谴责他们,而是谴责、控诉几个

从两个剧本看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陈涌

编者按:最近中国剧协、中国作协和中国电影举行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就去年上海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和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今日发表的陈涌同志和杜高、陈刚同志的两篇文章,是根据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整理的。文艺界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展开实事求是的、充分说理的讨论,互相切磋,畅所欲言,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促进文艺评论的发展是很好处的。我们希望今后共同努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步造成最有利于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气氛,以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年来留传下来,至今仍然象梦魇一样压住人们头额的封建意识。但作者的确也写得太阴暗了,在李丽芳的周围,看不到经过党领导下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变革的典型环境,这就使得作品的真实性受到很大的削弱。

王海南这个人物也写得比较真实。他本来是有理想的,但在“四人帮”那种环境中找不到出路,结果变得很孤独,思想很空虚的人,无所作为的人。作者描写王海南思想形成的过程是合理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殊而又复杂矛盾的条件下产生出的一种性格。根据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逻辑,他在他的母亲那里是“愚忠子”,在他父亲那里变成了“红后代”,他本身也自然是“狗崽子”。这个人物是有真实性的。

第二个问题,作品的主要倾向是什么?我感到《骗子》对干部的描写是有片面性的。干部的这个方面,使人看到了有缺陷,缺少一些东西。作者所描写的是有错误的干部,但他们还没有完全丧失革命革命干部的条件。既然这样,就存在一个对这些干部的态度问题。我们应该无情地批判他们那些肮脏的东西,但是对他们这些人,只要还没有完全批判,还不是不可救药的,我们就不能完全无情,还是要带着善意,要有关心、爱护的态度。现在有些简单化,几个人的干部都写成小丑,这不算一个界限的问题。《骗子》把几个有错误的干部都写成小丑,这简单了,除了吹吹拍拍、拉关系、走门路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这是已经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些干部缺少一种善意?如果他们当中有些是不好的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也同意许多同志的意见,认为要把典型环境写出来,但要做到这点,首先就要解决对现实生活的看法问题。《骗子》就包含着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会和现在有些不同。

在我看来,如果对现实生活的看法是全面、正确的,在一个具体作品中,即使写的全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也不一定会违反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我们进行具体分析,对现实生活的看法是会影响到创作的真实性的。

如果说,作者在揭露干部的错误的時候,对干部的看法是全面的,即使根据作者的描写,这个干部仍然没有失去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条件,那么对他就不能完全有恶意,没有与人为善的态度;另一方面,作者对那些本来没有明显而重大的缺点、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青年的缺点,却是另一种态度,是过多的同情、赞赏,以至对他们的缺点加以辩护。实际上,李小明、周明华、李丽芳、王海南,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程度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从从来没有过的。文化大革命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里是不合法的,在社会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需要逐步改造,但文化大革命中,它却受到保护和保护。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知识青年对党的信任,利用他们的纯洁,没有经验,利用他们当中的政府主义、极端主义、个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但直到现在还是在很严重的,现在还有不少青年,分不清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把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搞成无条件的、最革命的东西。社会主义的阶级应该站高一些,站得比李小明、周明华、王海南、李丽芳这些人高一些,应当不是简单地同情他们,他们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他们也要受谴责,要毒害。但是对他们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应不同情,对小瑞只考虑个人利益的思想不应该同情,对他的欺骗行为更不应该

级占优势的国家,而且也有长久积累下来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原因。现在许多青年,大多数实际上已经属于工人阶级,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受到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或者本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在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比较坚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抱着小资产阶级观点、情绪的人,对封建思想有联系的特殊化、官僚主义也是厌恶、痛恨的,他们的揭发批判往往是有机的,而且有时还是深刻的,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他们一方面往往容易模糊人内部矛盾和我矛盾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的界限;另一方面又往往容易模糊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在我们现在的一部分作品中,包括《骗子》和《在社会的档案里》在内,都得到程度不同的反映。

最后一个问题,真实性和倾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长期有争论的,两种经验都有。一种是十七年,往往只强调革命的真实性,忽视艺术的真实性,只讲政治不讲艺术,只讲倾向性不讲真实性,一个作品只要主题正确就被认为是好作品。以后,林彪、“四人帮”把这个倾向更加恶性化,更明目张胆地否定艺术的真实性,否定艺术的辩证性,否定艺术的现实主义,结果凡事等于没有艺术,“四人帮”垮台以后,文艺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作家大胆地反映生活,接触生活的矛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也丰富了现实生活的艺术经验。但是强调艺术真实性的时候,不是也有些人忽略了社会主义的倾向性,把艺术真实性和社会主义倾向性对立起来!例如有人认为,作家要是倾向的,问题只是艺术的问题。事情是否就是这样的呢?是的,每个作家都是有自己的倾向的,问题是是什么样的倾向?我们的要求是艺术的真实性和社会主义的倾向性的一致。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离开了真实,谈不到任何真正的艺术。这不但因为过去整个现实的艺术经验,而且也是我们五四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实,但这并不是说,思想倾向的问题便不重要了,便不重要,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我们面临着的《骗子》、《在社会的档案里》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作品,既有艺术真实性的问题,也有思想倾向的问题,而且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互相联系的。

《骗子》和《在社会的档案里》都有真实性,都在一定的程度上,甚至有些地方是应当肯定。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但也正如前边已经分析到的,这两部作品都未能给我们提供现实生活完整的真实的图景,这是和作者的思想倾向有直接关系的。这两部作品的系统程度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妨碍了他们正确地观察和认识生活,妨碍了他们按照生活本来面貌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这个经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深刻地论述了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和粉碎他们的斗争中,绝大多数老、中、青作家都通过了严峻的考验,在同全国人民群众思想和思想感情的提高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果实。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在文艺界贯彻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执行“双百”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作者们特别是大批青年作者在打倒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批判他们的反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在提高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方面,也有显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摆在作家面前。这就是说,必须在继续解放思想的同时,加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进一步和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应该在肃清林彪、“四人帮”思想毒害的同时,也要进一步改造自身的某些无产阶级的思想。

林彪、“四人帮”把世界改造的问题当作一个咒,当作一个绝对对立面,当作一个完全离开家的艺术实践,离开文艺规律的抽象的抽象,甚至当作一根打人的棍子,一顶压人的帽子。我们当然是要反对的,但并不能因为这样便取消问题的本身,相反的,在经过了对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歪曲,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严重破坏之后,我们也就取得了经验,更有必要与可能完整地、正确地解决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真实性和倾向性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

话剧创作繁荣兴旺的一年

杜高 陈刚

人们把一九七九年称为话剧创作的丰收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年来,话剧创作出现了一个令人喜悦和振奋的繁荣兴旺的局面。这是由于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在理论标准的讨论中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广大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汹涌澎湃,不断冲破了极左路线和极左迷信套在他们精神上的枷锁。话剧艺术带着它所特有的反映生活的敏感性、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迸发出它的艺术的光芒。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发挥出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话剧创作的题材范围更加广阔了,思想探索更加深入了,值得注意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崭新长征,成为这一年来的话剧创作中表现的新题材和新形象。舞台上出现了社会生活广阔的画面和重大的矛盾冲突,出现了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新人,和既有远大革命理想又有求实精神的共产党人的艺术形象。

一批从十年动乱的风暴中搏战成长的中青年、青年作者,从人民群众生活的深处,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在他们的前进中,反映出人民群众要求四化、要求前进的迫切愿望。他们敢于正视阻碍四化的陈腐落后的事物,敢于摒弃极左的传统观念和习惯的作法,敢于揭露和鞭笞思想僵化和官僚主义者的灵魂。这些话剧作品不仅真实地、比较深刻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新时期社会的时代现实,而且也反映出人民群众要求除旧布新的时代感情。

一年来如春潮般涌现了大批优秀和比较好的话剧,如《报春花》、《未来在召唤》、《权与法》、《救救她》、《向隅的响箭》等,在人民群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给予广大人民群众以思想教育和精神鼓舞,在广大建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主义制度的封建特权思想。作者怀着勇敢、勇敢地进行现实生活中一个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主題,坚持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法制,为了坚持正义而英勇斗争的市委第一书记罗放这一很有光彩的艺术形象。《权与法》的真实性和思想力量在于,它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个别领导干部(市委第一书记)利用职权违法乱纪的严重事实,暴露了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同时又着重地表现了革命的正义力量同这种现实冲突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并且通过戏剧冲突的发展,令人信服地显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人,置入死地于不顧的宣战宣言,坚定地要求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光明必将压倒黑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新与旧、革命与保守、实践精神与“本主义”之间不同性质的矛盾斗争,充满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然也会反映到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中来。话剧《向前向前》,从一个角度表现了拨乱反正时期激烈的思想斗争,批评了某些老革命因为因循守旧而成为新长征路上的严重阻力。但是经过斗争,终于使他们觉悟起来,思想得到解放,敢于摆脱过去的条条框框的束缚,重新踏上前进的步伐。

在这些新的话剧作品中,出现了一批个性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如《报春花》中的白洁、《未来在召唤》中的李莉、《向前向前》中的向来仪、《推开你心窗的》中的姜爱华,这些人物已象十七年时期我们的话剧中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那样思想成熟,而是经历了十年浩劫的考验,在动乱的岁月里成长,他们的精神上留下了伤痕,但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他们更富有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思想感情也更加深沉。这些作品中出现的有血有肉的艺术新人形象,具有新时期的历史特点,李健、梁明、罗放、

周雄武这些领导干部,都是经历了几十年曲折复杂的斗争锤炼,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今天重新起来,仍然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和正直勇敢的精神状态。他们热爱人民,懂得人民的苦和乐,同时人民共命运。这些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新的斗争面前旗帜鲜明的共产党人,是我们的硬骨头,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人。

从一年来话剧创作所反映的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内容和复杂的矛盾冲突,我们看到了时代的真实面貌,看到了我国人民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有了暴风骤雨,还有悬崖陡壁。林彪、“四人帮”十年封建专制统治,给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和阻碍四化的消极现象与阴暗面。“四人帮”组织上的残余和思想上的毒害,不能低估。一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特殊化和不正之风,也成为党团结人民群众向四化进军的障碍。必须反对创作揭露和批判这些消极现象,是要的,完全肯定的。那种讳疾忌医的态度是我们不赞成的。

但是,由于造成这些社会现象的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它本身的复杂性,需要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同时,在主观上要认识矛盾、想矛盾、生活积累、生活阅历是实现手法等方面的限制,因此作家也就面临着如何正确地认识我们这个在斗争中前进的时代,如何把握我们时代的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力量,如何准确地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的迫切课题。因此,当我们时代的作家和画家面临到反映青年犯罪现象和批评干部特殊化这些两难题材时,伴随着这类作品在舞台上的出现,也就同时提出了如何更全面地发挥戏剧艺术的积极作用的问题,如何更真实更深刻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社会矛盾等这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了。

应该谈到,在描写青年犯罪的话剧中也出现了好作品,如《救救她》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控诉了林彪、“四人帮”对青少年的严重毒害,促使某些青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同时又着重表现了社会主义

力量对失足青少年的争取和挽救。许多青年看了这个戏,受到强烈的感染和教育,觉悟起来,走上了自新的道路。这个戏所以能获得积极的社会效果,正是由于作者在反映这个消极的社会现象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生活的表面的真实性上面,而是通过它去表现本质的真实性,发现、把握、歌颂那个更强大的力,决定生活发展的真正力量。因此,作者不去详尽地描写少女李晓霞堕入歧途的曲折过程,也不把主要的戏剧场面对给给误入歧途的来展露丑态,而是怀着庄严的愤慨和愤怒,塑造出方老师这个为挽救失足青年而忘我奋斗,充满了社会主义崇高责任感和道德感的社会形象。方老师这个形象的积极意义在于,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对李晓霞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戏剧全部情节和冲突的展开,也是围绕着她方老师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对失足青年的挽救。

但是,在同题材类的某些作品中,也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有的作者用过于感伤的调调去描写青年的光明希望和绝望情绪,使人看不到光明和希望;还有的作者由于对现实性的片面理解,或者追求情节的离奇与刺激性,用自然主义的描写方法去过分渲染犯罪行为,为丑恶、凶杀和罪恶、要流氓和恶棍说话;这也就使人们感受到不美好事物的必然被毁灭的悲剧。不能指望人们为美好理想而斗争的信念。这样,在观众中,特别是在青少年的观众中,就不能不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

当然,也产生了一些好的作品,如通过一个青年犯人的亲身经历,来揭露和批判干部特殊化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

《骗子》、《在社会的档案里》这个剧本肯定肯定优点和长处,作者写剧本时是出于要引起对教这些病态社会现象的良好愿望,勇敢地触及了尖锐的社会问题,暴露出当前社会生活的消极面,批判了存在某些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这个剧本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这个戏引火烧火的争论,也

不是偶然的。许多同志对它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批评意见。是的,我们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某些干部的封建特权思想、特殊化和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中发展到罪恶的地步,这种毒流至今也没有肃清。但是必须看到,这些不正之风同我们不相容的,同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相容的,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不合法的。我们的文艺应当去暴露它和批判它。但我们的作家在表现这种一部分消极现象时,必须充分看到这些消极现象进行斗争,并不断克服和战胜它的积极社会力量。更重要的是,当作家从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或某一个部门看到干部特殊化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已在一定期限内成为那一个具体环境中的主要矛盾;但不能由此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认为干部特殊化和官僚主义,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假如我是真的》这个戏里出现的干部和青年的现象,虽有一定的生活依据,但是对于环绕着他们、促使他们行动的时代环境的描写,真实性和典型性就显得很不充分。同时,作者在对骗子的描写上,不适当地倾注了过多的同情,为的是把他的悲剧的罪责全部归于干部的特殊化,并且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假如我是真的,那就是合法的”。这就难免让人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仿佛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干部特殊化和不正之风的保护者。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社会的实际情况的。同时,在这样一个命题的指导下,作品对于干部特殊化和不正之风的揭露与批判,也就不可能是准确而深刻的了。

在我们话剧创作出现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出现有某些缺陷的作品,甚至出现某些不健康的思想和艺术倾向,是百花齐放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是在探索反映我们前进中的现实生活时难以避免的。这些作品也带着我们新旧交替、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它们不要淹没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继续前进。

